

中国和八国集团经济政策 协调的经济基础分析

戴金平, 靳晓婷, 林铁铮

(南开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要:为研究中国和八国集团(G8)是否存在经济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文章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为依据,从经济相互依存度考察政策协调的基础。通过选取衡量经济体相关性和趋同性的标准,对中国与八国集团中七个主要发达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进行比较。贸易的相关性和部分政策变量指标的趋同性,说明中国和七国已表现出一定的经济政策协调基础。但是,运用VAR模型对影响经济波动的深层因素——供给和需求冲击进行对称性分析,却显示中国与七国冲击对称性尚不显著,表明中国与七国相比参与政策协调的成本会比较大。所以,中国目前可急于全面参与G8的政策协调,而应先利用当前的对话机制,加强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逐步探索未来协调的步骤和领域。

关键词:八国集团(G8);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经济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83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12-0028-10

一、引言

八国集团(G8)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组成,其前身七国集团(G7)(不包括俄罗斯)成立于1976年,定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以及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实践组织,其关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世界经济增长与稳定、汇率政策、经常账户失衡、该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经济体系的整体设计。G7在干预石油价格、稳定美元汇率、处理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以及领导金融危机的救援等方面都曾取得显著的成效。1997年俄罗斯的加入使G7变成了G8,但俄罗斯在参与集团的经济政策协调方面还处于逐步融入的过程中,所以本文仍以G7成员国为主来讨论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8-09-28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05JJD63002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07&ZD054)

作者简介:戴金平(1965—),女(满族),河北沧州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

靳晓婷(1981—),女,山西大同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林铁铮(1985—),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近年来,为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G8日益重视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并从2003年开始邀请中国、印度等国在财政、金融、能源、卫生等领域举行了一系列部长级对话。在2007年的G8峰会上,德国倡导并启动了旨在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的“海利根达姆进程”;在2008年的G8首脑会议中,会议讨论的高油价、高粮价、非洲发展、生态保护等全球性议题,无一例外都不可能绕开中国而得到解决。这说明在国际重大问题的协调合作上G8日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同样,中国在经济不断开放的过程中也需要站在G8这样一个国际平台上表达声音,为经济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且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中国会同联系紧密的发达国家面临一些共同的经济问题,这就更离不开与发达国家政策上的协调合作。所以我们需要探讨中国是否在经济基础上具备了参与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政策协调的条件。本文将从经济相关性和趋同性的角度,来比较中国同G8中经济政策合作较密切的七国(除俄罗斯外)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以检验中国与这些国家是否存在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

二、理论框架

Henning(1987)提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对一国或若干国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以减少这些政策对他国的负面影响(或加强正面影响)”。在经济存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一国要实现内外均衡目标须进行政策的国际协调,以避免分散决策带来的损失。下面,我们将首先回顾国际政策协调理论中有关经济体相关性方面的理论,然后将其应用于对中国与G8经济政策协调的分析中。

(一)理论回顾:经济相互依存是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基础

美国学者Cooper早在1968年就指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是进行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经济协调的收益随各国之间依存程度而变化。Frenkel,Goldstein和Masson(1990)指出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决定了国际因素对国内政策的影响。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流动,一国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他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造成影响。要达到一国就业与通货膨胀的优化组合,就需要在决策的过程中,将政策的外部变量充分考虑进来。Keleher(1993)也指出经济体之间的日益趋同,一方面表明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分工的加强,需要调整原有的价格体系在合作的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经济的日益融合意味着各国政策的独立性渐渐减弱,传统的国内经济政策无法在开放的市场下实现本国内外均衡的目标。Hamada(1997)明确指出宏观经济的相互依存至少由三个要素决定:一是在一个由 n 国组成的世界中,趋于只有 $n-1$ 种相互联系的汇率以及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二是当国家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时,商品、服务及资本之间渐渐可以相互替代;三是存在少数几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它们的政策会影响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产出、就业、通货膨胀、利

率、汇率、国际收支平衡及外汇储备。

为了衡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合作的文献主要从各国经济的相关性或趋同性来考察,考察的指标例如 Cooper(1968)考察进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否日益增加;Branson, Frenkel 和 Goldstein(1990)考察本国主要市场上国外商品和服务是否不断增多;各国通货膨胀率的趋同度;两国间的银行同业拆借率差距是否明显缩小;两国短期金融市场债券利率和长期债券回报率趋同度等。另外,在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最优货币区研究中,宏观经济的冲击对称性也可以作为衡量经济相关性的有效指标。若经济周期不对称,冲击的影响是异质的、非对称的,则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就比较大。例如,Mundell(1961)和 Tower 及 Willett(1976)指出,产出和贸易结构的对称性,将使经济面临的冲击来源相对一致;经济周期的对称性和趋同,将协调政策目标,增加共同货币政策的溢出效果。Fleming(1971)提出了政策偏好的相似性为共同货币政策提供了利益支持和均衡的成本和收益分配。在增加货币合作收益的因素研究中,Rose 和 Engel(2000)对世界范围的货币联盟成员间贸易联系和趋同性的研究分别从开放度、分工的深化程度(以 Herfindahl 指数衡量)、贸易一体化程度(运用引力模型)、价格的稳定程度、商业周期的同步性及风险联系程度六个方面考察了经济的融合水平。

(二)经济相互依存:加入 G8 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经济基础

根据 G8 经济政策协调的领域和机制特点,并基于以上从经济相关性和趋同性来考察相互依存度的研究文献,我们选取如下指标来衡量 G8 经济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

首先,通过各国间的双边进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宏观经济冲击对称性来考察各国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政策协调的经济成本。然后,对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相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同性进行研究,从政策偏好的相似性角度考察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具体地,从政府赤字(盈余)占 GDP 百分比的相似性来看财政政策协调的空间是否相近;从通货膨胀率和基准贷款利率看货币政策协调的可能性;从汇率政策和调节机制的比较来看汇率政策合作的基础和平衡经常账户的政策协调基础。综合以上的相关性和趋同性标准,来讨论中国是否存在加入 G8 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经济基础。

三、实证分析

对于 G8 政策协调机制而言,讨论经济相关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一国在全球经济的代表性。在过去的 20 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年平均增长率,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1985 至 2007 年中国年均 GDP 占全球 GDP 的比重与七国相比,仅次于美国、日本(据 Bvd 数据库数据计算)(见图 1)。在贸易领域,根据中国海关总署 2007 年 1 月的数据,2006 年中国与欧

盟、美国和日本前三大贸易伙伴贸易额均超过2 000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截至2006年9月底,来华投资的国家 and 地区近200个,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王超,2006)。从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稳定所起的作用来看,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Kirton,2001),2001年又成功促成了《清迈协议》的签署,为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与七国经济相关性分析

1. 贸易相关性

首先,我们从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来看经济的相关性,选取七国与中国双边进出口额占各国总进出口额的比重进行比较。从表1可以看出,到2006年中国已成为七国重要的出口贸易伙伴国,尤其对美国和日本都占有突出的份额。同时,表2显示中国在七国的进口中也占有很大比例,七国从中国的进口中比重最低的都达到2.3%,已经高于部分七国成员间的进口比重;七国还是中国比较集中的进口品来源国,进口份额累计达到了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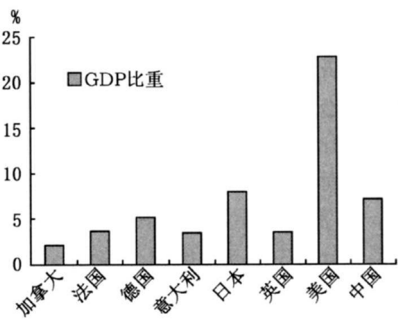


图1 1986—2007年七国及中国
年均GDP占全球GDP比重

表1 2006年双边出口额占各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横行为出口国) 单位: %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中国
美国		82.3	22.8	6.7	8.6	7.6	13.9	21.0
加拿大	22.2		1.5	0.7	0.7	0.4	1.7	1.6
日本	5.8	2.1		1.5	1.5	1.4	1.7	9.5
法国	2.4	0.6	1.2		9.7	11.7	10.4	1.4
德国	4.0	0.9	3.2	15.6		13.2	10.9	4.2
意大利	1.2	0.4	1.0	8.9	6.7		8.9	1.6
英国	4.4	2.2	2.4	8.2	7.3	6.1		2.5
中国	5.3	1.7	14.3	2.1	3.1	1.8	1.4	

数据来源:根据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7)数据计算,表2同。

表2 2006年双边进口额占各国总进口额的比重(横行为进口国) 单位: %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中国
美国		55.1	12.0	2.4	5.1	3.1	2.4	7.5
加拿大	16.0		1.7	0.1	0.4	0.4	0.1	1.0
日本	7.9	3.9		1.5	2.4	1.6	1.5	14.6
法国	2.0	1.3	2.0		8.7	9.2	0.9	1.4
德国	4.8	2.8	3.2	19.0		16.7	1.3	4.8
意大利	1.8	1.2	1.2	8.3	5.5		0.8	1.1
英国	2.8	2.7	1.2	6.5	5.9	3.5		0.8
中国	15.9	8.7	20.5	3.7	5.9	5.2	2.3	

2. 宏观经济冲击的对称性

分析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能够从影响经济波动的更深层因素——需求和供给冲击角度揭示经济相关的程度,并能进一步提供关于采取相近经济政策的成本分析。参照 Eichengree(1997)研究欧洲经济冲击对称性的方法,即假设经济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是正交化的,并根据宏观经济模型假定设定约束条件,然后从原始数据的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冲击的大小,我们设定计量模型来分析中国与七国冲击的对称性。

产出和物价的变动可以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无限加总过程来描述,即:

$$\begin{pmatrix} y_t \\ p_t \end{pmatrix} = \sum_{i=0}^{\infty} L_i \begin{pmatrix} a_{11} & a_{12} \\ a_{21} & a_{22} \end{pmatrix} \begin{pmatrix} \epsilon_{dt} \\ \epsilon_{st} \end{pmatrix}$$

其中: L_i 是滞后算子, ϵ_{dt} 、 ϵ_{st} 分别代表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将产出和物价的 n 期滞后向量自回归 VAR 过程写成残差项的无限移动平均过程,其残差项为 e_t 。该残差同结构式扰动(供给和需求冲击)之间的关系是 $e_t = C\epsilon_t$,由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满足正交化条件,并将其标准化,可以得到 $C'C = Cor$,其中 Cor 是 VAR(structure vector auto regression)过程生成的残差相关系数矩阵。通过 Eviews6.0 的运算可以识别供给和需求冲击。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择 1980—2007 年作为考察的时间段,产出用不变价格的 GDP 指数来描述,以 1996 年为基期;用同样基期的 GDP Deflator 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以上数据均取自 BvD 数据库。所有数据取对数后,进行 Johanson 协整检验,使用赤池准则来判断选择 VAR 过程的滞后阶数。对于多数对象,VAR(2)能够很好地描述数据的动态,同时为了使生成的结论具有可比性,统一选取 VAR(2)。对 VAR 脉冲反映的值加总求和(选 100 期近似替代),然后根据约束条件,就可以从所求的和中解出冲击行列来。

表 3 需求冲击的相关性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0.159						
德国	-0.146	-0.581 *					
意大利	0.201	0.534 *	0.455 *				
日本	-0.080	0.259	0.023	0.117			
英国	0.121	0.135	0.094	0.131	-0.010		
美国	0.602 *	0.035	0.073	0.320	0.216	0.355	
中国	0.268	-0.282	0.019	0.197	-0.310	0.326	0.230

注: * 代表相关系数可以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水平,表 4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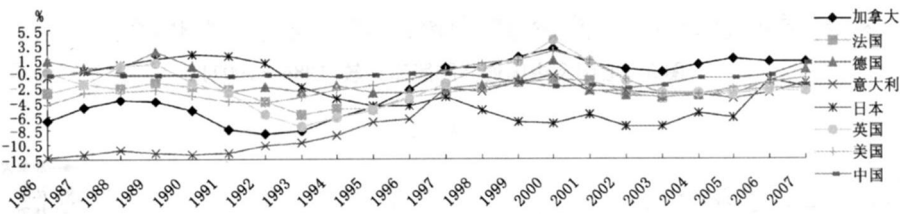
表 4 供给冲击的相关性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0.178						
德国	0.477 *	-0.322					
意大利	0.478 *	0.243	0.755 *				
日本	-0.098	-0.244	0.096	0.250			
英国	0.359	-0.183	0.528 *	0.207	0.152		
美国	0.832 *	-0.076	0.532 *	0.438 *	0.271	0.367	
中国	-0.071	-0.299	-0.333	-0.061	0.369	-0.323	-0.181

表 3 和表 4 列出了各国遭受需求和供给冲击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符号可以揭示经济体之间冲击的作用方向,而相关系数的大小则可以揭示经济体之间面临冲击的力度差异。根据实证结果比较,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加拿大和美国在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对称性,体现了两国经济联系的紧密;欧洲国家中,法国同德国、法国同意大利、德国同意大利之间存在比较对称的需求冲击;德国同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美国;意大利同美国、加拿大存在供给冲击上的两两正相关关系。而中国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冲击,同各发达国家经济尚不具有显著的对称性。发达国家表现出的冲击对称性表明其在进行政策的合作和调整中,会面临比较小的调整成本。中国同发达国相比,面临政策协调的成本会比较大。

(二)中国与七国政策相关经济指标的趋同性

接下来,针对 G8 政策协调的关键领域,我们对与这些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相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同性进行研究,从政策偏好的相似性角度考察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December 2003;BvD 数据库,图 3、图 4 同。

图 2 中央(联邦)政府赤字(盈余)状况(占 GDP 的百分比)(1986—2007)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七国和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财政状况普遍转好,使得各国利用财政政策调节国内经济的空间增大,客观上为财政政策更多地参与国际协调打下了良好基础。因为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工业化七国的财政状况普遍陷入困境的时期,各国往往在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上受到极大制约。尽管各国赤字在 2003 年左右又有所恶化,但近年来都朝着

改善的方向发展,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与七国相比,中国赤字的走势一直相对平稳,并且近几年与七国呈趋同的改善趋势。在短期内,中国从 2007 年 8 月起进行的利息税改革和 2008 年的自然灾害可能会使财政难以持续前期改善的势头,但 2008 年发达国家也普遍面临经济条件的恶化,共同的困境增强了政策合作的必要性,而且前期的财政积累也为政策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从图 3 的通货膨胀率比较中可以看到,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的大起大落相比,中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在 1997 年之后与七国的趋同度明显增强。尤其从近期来看,中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通胀的输入。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中国与七国在货币政策上进行协调干预,就会比一国单独的政策效果明显。图 4 的比较显示,除日本长期保持低利率外,中国和七国基准贷款利率变化也呈现出趋同,这两个指标的趋同都对各国央行进行货币政策协调的可能性给予了支持。在部分经济条件日益成熟的前提下,中国是否会与七国在货币政策上利用利率等工具进行联合干预,当然还要取决于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分配:是主要在寻求国内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最优组合,还是服务于调节外部目标,即一国的汇率稳定。但是在经济变量显示日益趋同和协同波动的趋势下,一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越来越难以靠独立的调控来实现,协调的必要性随着趋同趋势的显著已不断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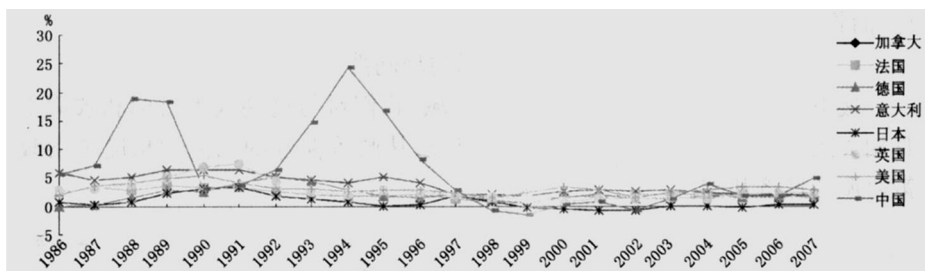


图 3 七国及中国通货膨胀率比较 (1986—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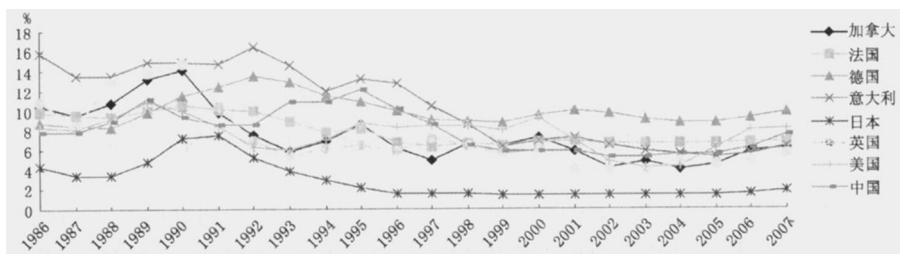


图 4 七国与中国基准贷款利率比较 (1986—2007)

在汇率方面,主要工业国家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外汇市场干预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汇率调节的主要手段。1987 年 2 月由西方六国财政部

签署的《卢浮宫协议》，达成了“汇率目标区域”的共识，以汇率目标区域调节其机制内部的货币关系。参照欧洲汇率目标区的经验，为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胀输出，其成员需要在参与任何新的汇率协定之前，以及在参与的过程中满足标准要求条件。工业化七国虽不必完全采纳马斯特里赫特的惯例，但强调促进财政赤字的减少，低通胀，长期利率接近低通胀国家水平（朱光耀、唐臻怡，2003）。在这些基础条件上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和条件都相当趋同（见图3），美国和德国的短期利率也相当接近（见图4），日本则相应低一些。这说明汇率稳定的目标在七国内部会比较顺利地实现。对中国而言，通过前面数据的比较，我们看出中国与七国在这些基础条件上有趋同性，表明未来有进行汇率政策合作的可能性。并且，中国已经在2004年与西方七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的首次对话中，就增加汇率灵活性和基于市场的汇率机制改革进行了讨论；2005年7月开始宣布采用了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更增大了中国和七国在其他经济政策进行协调的空间。另外，汇率还与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协调政策相联系。在集团成立初期，只有国际贸易依存度较小的大经济实体如美国希望通过调整汇率应对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贸易依存度大的小型经济体希望通过调整国内需求来消除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但是，近年来由于贸易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各经济体普遍趋向汇率调整（朱光耀，2003）。中美贸易不平衡是G8关注的重要问题，人民币汇率放宽波动区间并不断升值使G8在解决贸易问题上的对话看到了成果。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和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仅仅靠汇率的调整还难以在短期内使经常项目有明显的调整，未来还需要在其他领域的协调合作才能有序地扭转当前不平衡的格局。

从前面的实证比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G8集团内部，七国之间经济相关的紧密程度不同也会使其在政策协调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合作伙伴，所以未来中国在考虑参与政策协调时，也要根据经济的相关性选择协调的领域和重点协调的国家。

四、结 论

本文从宏观经济相关性和趋同性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和G8中七国成员经济体进行经济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在全球代表性方面、同发达国家的贸易联系方面以及近年来政策偏好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方面，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经济政策协调基础。但在宏观经济冲击对称性分析中，实证结果反映出中国与七国尚不具有显著的对称性，相关性还不紧密，与七国相比参与政策协调的成本会比较大。本文所做的分析只是从一些角度研究了中国和七国进行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关于中国和G8政策协调的很多条件和影响因素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政策方面的协调是一个必然的

趋势,经济联系的加强也不断增强了这种必要性。在实践中,需要探讨的是中国与 G8 的协调步骤和协调领域。由于在 G8 内部,发达国家也经常存在分歧,中国就需要考虑应侧重与哪些发达国家进行政策合作。目前,G8 内部对于吸收新成员国仍未统一意见,但是发展中国家与 G8 成员国对话的机制已经形成,这一契机必然会促使中国和 G8 各国的政策协调不断走向成熟,同时也会不断加强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对外经济联系。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如果能够尽早通过固定有效的磋商机制同发达国家就双方或多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于各方都具有较明显的意义。中国目前可就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能源、粮食安全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同 G8 成员国进行磋商,同时可借助 G8 峰会的机制,加强同其他参与八国集团峰会的发展中国家的协作与联系,以期在有序缓解全球不平衡、减少次债危机、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压力对各国福利的影响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协调合作中不断维护和提高中国及世界各国的整体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 [1]朱光耀,唐臻怡.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协调机制与对华经济政策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46—122.
- [2]王超.“2006 民营企业对话世界 500 强”论坛在温州开幕王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信息化司, <http://xxhs.mofcom.gov.cn/aarticle/c/d/200611/20061103685640.html>, 2006. 11. 9.
- [3]Branson W H, Frenkel J A, Goldstein M.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9—62.
- [4]Cooper R N. The Economics of in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 [5]Eichengreen B.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analysi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7: 53—71.
- [6]Fleming J M. On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J]. Economic Journal, 1971, 81: 467—488.
- [7]Frenkel J A, Goldstein M, Masson P R. The rationale for, and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A]. Branson W H, Frenkel J A, Goldstein M.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8]Hamada K, Masahiro K.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A]. Fratianni M U, Dominick S, Jurgen von H.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policies[C].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and London, 1997: 87—147.
- [9]Henning C R. Macro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1980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D]. Atlantic Paper No. 65. London; New York: Croom Helm for the Atlan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7.

- [10] Keleher Robert E. Policy responses to increased economic integration[J]. Cato Journal, 1993, 2(13)2: 279—289.
- [11] Kirton J. The G7 and China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EB/OL]. <http://www.g7.utoronto.ca/g7/scholar/kirton199903/index.html>. 1999. 12. 12.
- [12] Mundell R A. Theory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 657—665.
- [13] Rose A, Engel Charles. Currency un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D]. NBER Working Paper No. 7872, September, 2000.
- [14] Tower E, Willett T D.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D]. Princeton Special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11, May, 1976.

Analysis on Economic Basis of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8

DAI Jin-ping, JIN Xiao-ting, LIN Tie-zhe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paper studies the economic basi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roup of Eight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pendence. It makes a comparison of economic 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seven main developed countries by selecting indexes of economic correlation and convergence. Trade correl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some indexes related to policies indicate that a basis of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even countries has been formed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rough a VAR model the symmetry analysis on aggregate supply and demand shocks shows tha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of strong convergence and it means the cost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coordination would be higher than the seven developed countries. So at present it is not the time to completely join in the policy coordination of G8 for China. China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dialog mechanism, enhance th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creasingly explore the steps and field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roup of eight;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economic correlation

(责任编辑 周一叶)